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播四十周年

中国国际广播史料简编

THE 40 YEARS OF RADIO BEIJING

Brief Annals of China's
Overseas Broadcasting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国际广播史料简编

(1947——198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史编辑组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474734

中国国际广播史料简编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史编辑组编

• •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2号)

水利电力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333千字 12³/₄印张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 • •
ISBN7-80035-011-8/Z·4

书号：17445·004

• 内部资料 供领导参阅 •

2011/1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史编辑组

胡耀亭 曾平 金初高 陈达敏

刘尔煌 高学玉 尤华骏

前 言

中国人民的对外广播事业，从1947年9月创办英语广播开始，到今年已经整整40年了。

40年来，主办我国对外广播事业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逐步发展壮大，现用38种外国语和5种本国语（汉语普通话和4种方言），每日定时对国外广播累计142.5小时，播音时数和播用语种在世界各国对外广播中居第三位，是当今世界上影响较大的国际广播中心之一。

为了纪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播40周年，回顾各语言部组和对外广播事业的发展历史，较系统地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以进一步推动改革、加强和发展我国对外广播事业，我们编印这部专集，以供领导和有关部门参考，并借以积累、保存有价值的史料。

本专集内容分为七部分：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40年，记述我国对外广播发展情况；二、各种外语广播的开办和发展，记述我台38个语言部组的工作和发展情况；三、对华侨广播的历史和现状，记述我台华侨部用汉语普通话及4种方言对外广播的工作和发展情况；四、编辑发稿部门的设立和发展，记述我台各类广播节目逐步形成，不断丰富的进展情况；五、同外国听众联系和对外交往活动情况；六、工程技术、调查研究和书刊出版工作的情况；七、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事。另外，考虑到对外广播的竞争性很强，本专集选载了两份材料作为附录，记述我国对外广播在国际宣传活动中的地位、影响，以及面临的激烈竞争和当前国际广播发展的态势。

本专集各部分文稿是由国际广播电台有关部(处)、组的同志

分头执笔的。由于各部门情况不一，体例也就很难统一。例如，有的部门较突出地回顾了宣传方针演变、重大宣传活动、广播在对象地区影响扩大的情况；有的部门较具体地介绍了节目设置、节目构成和所办名牌节目的变迁、改进等情况；有的部门较全面地总结了广播宣传业务或听众工作经验等等。各部分文稿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有的对历史演变、机构沿革和人事变动记载较具体，有的则较简略；有的较均衡地记述了几十年间各个时期的工作；有的则较集中地记述了某些年份某些方面的史实；有的还具体地提到了一些同志的姓名。为了反映各单位工作情况的特点和多样性，我们在汇编中都大体上保留了原来面貌。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第一批比较全面地反映各部门工作情况的史料。这些文稿大都是在各部门领导同志组织讨论、研究和总结的基础上，由专人执笔的，有的还经过集体讨论和修改，或经过领导同志的指导和审核。多数文稿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史实和经验，有长久保存参阅查考的价值。

由于编者水平，时间和人力所限，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方面同志批评、指正。

本专集是内部发行的参考资料，所有内容请勿公开引用。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史编辑组

1987年1月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0周年纪念
目 录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40年	胡耀亭	1
各种外语广播的开办和发展		25
(以开播先后为序)		
英语广播	麦少楠等	26
日语广播	日语部	40
印度尼西亚语广播	林六顺	50
越南语广播	文彬 李广才	56
泰语广播	杨惠娟	67
缅甸语广播	王善忠 杨钦炯	72
朝鲜语广播	柳云璧	74
西班牙语广播	杨林常	77
柬埔寨语广播	邢和平	84
老挝语广播	李春武	87
波斯语广播	李玉琦等	92
土耳其语广播	土耳其语组	97
阿拉伯语广播	张允谟 刘元培	102
法语广播	高发明	112
马来语广播	李士君	123
印地语广播	孙宝纲 陈宗荣	128
德语广播	何廉	133
葡萄牙语广播	马恩溆	139
意大利语广播	周平宇	143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广播	李坚	151

斯瓦希里语广播	陈家宇	李首道	155
俄语广播	陈毅明	李如衡	莫恭敏 160
豪萨语广播		李 绚	169
泰米尔语广播		王保石	175
蒙古语广播		铁 犁	179
世界语广播		世界语组	184
菲律宾语广播	李 林	许雪冷	191
乌尔都语广播		赵景秀	195
捷克语广播		陈治昶	201
波兰语广播		陆鸣权	204
罗马尼亚语广播		徐文德	211
孟加拉语广播		石景武	215
阿尔巴尼亚语广播		侯玉萍	219
普什图语广播		普什图语组	222
保加利亚语广播		郭全荣	225
僧伽罗语广播		孔令保	227
尼泊尔语广播		陈敏毅	233
匈牙利语广播	张钟英	刘思岳	237
		曾应和	240
对华侨广播的历史和现状			
编辑发稿等部门的设立和发展			
国内新闻编辑部		陈达敏	252
国际新闻编辑部		陈 苇	266
文艺节目编辑部		刘志铭	276
体育报道工作		刘经哲	282
国际台研究室设立30年来工作回顾		金初高	286
同外国听众联系和对外交往活动			
听众联络工作		张鹤仙	293
外事处成立以来的工作回顾		林星灿	300
工程技术、调查研究和书刊出版			
播控技术系统的发展和现状		邵昌耀	307

业务刊物《研究与实践》的创刊和成长	吴志成	313
出版园地的一株幼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简介	吴绪彬	31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事	曾平	320

附 录

我国对外广播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		
——回顾我对外广播跃居世界第三位前后的国外反应	金初高	372
世界各国对外广播的态势和竞争	张振华	38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40年

胡 耀 亭

我国唯一向全世界广播的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已进入“不惑”之年，满40岁了。

如同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正当经验丰富的壮年。

在过去漫长的14,600多个日日夜夜里，它传播着中国之声，用电波架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之桥”。今天，10亿中国人民的声音在全球回响，听众朋友遍天下，五洲四海遍知音。当然，无可否认，它也面临严重挑战。在纪念我国对外广播创办40周年的日子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它所走过的光辉道路。

—

40年来，中国人民的对外广播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一）第一个十年——开创阶段

1947年9月1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的对外广播诞生了。

当时，设在太行山下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增办了每天20分钟的英语广播，报道我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和主张，以及解放区的人民生活。第一篇广播稿是由魏琳同志广播的。广播稿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里是陕北新华

广播电台，从今天起，本台用英语向世界的朋友们广播。”当时的发射功率只有1千瓦，显然不能发射很远，但在国内和邻近中国的地区还是有不少听众的。那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为了避免遭受轰炸和破坏，电台隐蔽在山沟农民家里，而且常常因为打仗不断迁徙，最先在河北省涉县的沙河村，后又迁到井陘的窟窿峰村。编辑部与发射台相距几十里，稿件靠人传马带。播音室设在土窑里，鸡鸣狗吠之声不时干扰着播音。发射机是用从国民党军队缴获来的一部空军导航报话机改造的。开始曲使用的是一张旧唱片——意大利歌剧《阿依达》中的《胜利进行曲》。

除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以外，张家口、哈尔滨两城市也曾先后在当地电台开办过英语和日语广播，后来停办了。最近在广州发现延安华侨联合会在1946年7月24日写给马来亚侨胞曾春水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详细抄录了当时延安及张家口广播电台的呼号、播音时间和波长，还特别标出了英语广播时间，并希望海外侨胞在“环境许可”时，“能多多收听”。当时正值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内战危机四伏，海外侨胞对于祖国的前途命运极为关切，迫切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曾春水先生为此拍电报给毛泽东主席。延安侨联会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写了一封回信给曾春水先生。

对外广播的真正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北京一解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同新华社分开，并成立了中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后来改为中央广播事业局，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新中国的诞生，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友好国家纷纷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周围的各国人民都想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海外侨胞渴望知道祖国的新生和故乡的新貌；所有国家都想了解东方这个大国所发生的一切和它的影响。这种客观形势要求我国对外广播必须大发展，这时也确实有条件了。当时，中央的方针是，第一步首先解决对我国周围地区国家

和海外侨胞的广播问题。

1949年6月20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日语广播开始播音，这是对外广播的第二种语言。1950年4月10日，对东南亚地区华侨广播的广州话、厦门话、潮州话、客家话广播开始播音。就在同一天，越南语、缅甸语、泰语和印尼语广播也开始播音。1950年7月2日，朝鲜语广播正式播音。

从这时开始，对外广播开始用“北京广播电台”的呼号播音。对华侨广播则使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至此，我对外广播共有四种汉语方言和七种外语，每天播音7小时。

这时在组织机构方面也进行了调整。过去对外广播编辑部是和对内广播编辑部合在一起的，自此，成立了国际广播编辑部，专管对外广播的业务。

1951年初，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台举办了专门对侵略朝鲜美军的英语广播节目，揭露美国的欺骗宣传，阐明我抗美援朝的严正立场和主张。这个节目一直持续到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前夕为止，影响是巨大的。例如1951年11月15日，播送侵朝美英俘虏的讲话录音，战俘通过广播向自己的家属讲述他们在战俘营里受到的人道主义的待遇，现身说法，有力地戳穿了美国、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捏造的所谓朝中方面“虐待”战俘的谎言。这样的广播内容不仅战俘家属和美军官兵关心，一般外国听众也有兴趣。新西兰一位听众自动录下200多个战俘的广播讲话，转寄给他们的家属。

1952年11月，每天增设一次以俄语对苏联听众广播的《中苏友好月》节目，主要由讲演和中国音乐两部分内容组成。1954年12月24日，正式开办对苏联的俄语寄送节目。这是根据中苏广播合作协定开办的。

1955年12月15日，对东南亚华侨广播的普通话和对欧洲使馆人员、留学生广播的普通话节目正式播音。

1956年6月至9月，日语广播连续播出了我国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华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其中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大多数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免于起诉

的决定书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少数日军战争犯罪分子的判决书等重要文件。与此同时，还播送了获得释放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谈话及座谈会的录音、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表演的文艺节目录音、被依法判刑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和前来探望他们的家属谈话录音。通过这些报道广泛地宣传了我国政府严正而宽大的政策。日本各地电台曾多次转播上述节目，并通知战争犯罪分子家属收听。日本听众纷纷来信表示对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感谢。东京一位听众来信说：“听了获释的战争犯罪分子的讲话和他们演奏的音乐节目，使我感动得流下泪来。我不知怎样向中国人民道歉才好，只想望着远处的天空，尽量大声哭泣。”另一位听众来信说：“日本曾用武力长期践踏中国人民，对这样的日本人，中国人伸出来的是友谊之手，而不是报仇。我父亲在中日战争中是一个邮递员，后来战死了。当时我曾想要做个军人为父亲报仇。现在认识到这是错误的，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为了向中国政府赎罪，我要努力促使中日邦交的恢复。”

从1952年到1956年，我台对外联系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先后同35个国家和地区的广播电台建立各种关系，包括寄送节目、音乐磁带。当时的日本、越南电台还经常转播我台节目。那时我台还每天抄收美国、英国、印度、日本等国电台的广播新闻，并编印成“收音快报”，送有关部门参考。

50年代初期，我国对外广播存在不少困难。从领导干部说，缺少对外广播经验，编译和播音员大部是从海外回国不久的青年，对国内情况不熟悉，中文水平不高。当时的技术设备也有限。广播有效的收听地区主要是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国家。然而，我国的对外广播事业毕竟建立起来了，它的影响在一天天扩大。1951年收到18个国家和地区的听众来信1,000封。1953年收到42个国家和地区听众来信1,906封。1954年收到47个国家和地区听众来信2,296封。1955年收到52个国家和地区听众来信7,365封，1956年收到62个国家和地区听众来信15,284封。和1951年比较，增加15倍。当时，英国广播公司发表的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对外

广播规模在1950年居于世界第十二位，1952年升为第十一位，1954年为第九位，1955年为第七位，1956年为第五位。

（二）第二个十年——大发展时期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十年，正是世界大动荡的年代。这一时期我国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中央决定大力发展对外广播事业，要求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对外广播的规模、语种、播音时间等方面，力求达到世界的第三位，仅次于苏、美两国。很快，一些大功率发射台相继建立了，各种语言干部陆续培养出来了。美国新闻署在1958年就此发表评论说：“从1948年到1957年，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广播时间增加了20倍，从每周16小时增加到317小时，在红色集团的广播宣传中仅次于苏联。”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前夕，我国对外广播先后增办了老挝语、柬埔寨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马来语、印地语、泰米尔语、菲律宾语、蒙古语、法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以及世界语等20个语种的广播。上原有的语种共达27个语种，覆盖面包括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大洋洲等世界大部分地区。对华侨广播增加了台山话方言（1957年6月开办，两年后因故停办）。

这些语种的增加，使我国对外广播事业迅速超过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居于世界的前列。英国广播公司在1960年发表的年度报告说，中国对外广播已取代该公司地位而成为世界第三个最大的对外广播中心，仅次于苏联和美国。英国《每日快报》惊呼：“在争取世界各国听众的广播战中，中国把英国打败了。”1964年，法新社报道说：“不论在白天或者黑夜，只要扭开收音机，转到正确的波长，就可以收到北京电台的广播。中国播音员使用着国际上通用的每一种语言，他们的声音传到了地球上遥远的角落。”60年代初，美国总统肯尼迪抱怨说：“在我们自己的

半球上，单是共产党中国进行的公开语言广播就比我们多。”

《纽约先驱论坛报》也发表文章说：“北京电台的短波信号在北非、东非和中非广大地区最为强大，不论在偏僻的森林或是遥远的村庄里，都可以清晰地听到。”

当时，外国舆论普遍承认，中国对外广播由于规模和实力增长，在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宣传影响，受到了各国人民和进步人士的热情赞扬。英国《泰晤士报》说：“在对远东广播方面，中国占据了整个舞台。”我台对日广播在日本的影响显著增长。在日本友好团体的推动下，从1961年起，日本各地广泛成立“北京广播听众之会”，涌现出一大批收听我台广播的积极听众。1962年围绕中印边界问题展开的斗争，我台广播不论对印度国内或者对整个东南亚和全世界都发挥了巨大的宣传影响。印度政府官员和美英报刊承认，北京电台在宣传报道的时效、质量和手法方面始终走在全印电台的前面。在非洲收听我广播的人不断增多。1961年美国《明星晚报》说：“越来越多的戴头巾的阿拉伯人聚集在收音机周围，收听北京电台的宣传，西方观察家们对此越来越感到不安。”在拉丁美洲，也有不少人收听我广播。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由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属于穷国一类，中国在那里找到了一片宣扬革命的肥沃土地”，因而该报一再谈到“北京电台在拉丁美洲找到了听众”。

从1963年到1965年，我国对外广播在全世界影响达到一个高峰。1963年收到114个国家和地区听众来信208,534封，相当于上一年的3倍以上。1964年收到135个国家和地区听众来信154,597封，1965年收到135个国家和地区听众来信286,163封，创造我台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在这一时期，我台每天广播70小时30分，其中对亚洲广播40小时，对非洲广播10小时，对拉丁美洲广播4小时30分，对北美广播8小时，对澳、新地区广播2小时。

1960年11月，周总理批准了广播局党组《关于目前我国对苏联广播和苏联对我国广播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1962年1月，

中宣部和中央外事小组向中央报告我俄语广播节目方针，邓小平同志批示同意，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同志圈阅。1963年7月，周总理指示我台24种外语节目和对华侨及驻外使馆广播五种华语节目，对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要连续广播三天。1965年10月，周总理亲自指示，我政府就越南南方伪军派飞机轰炸柬埔寨所发抗议声明，用各种语言广播。邓小平同志还在1961年10月审过我台俄语广播稿件。在这期间，周总理还对改进对日广播提出具体意见。总理认为，对日宣传比较生硬，特别是广播。他强调对日宣传要适合日本情况，要使中间分子能够接受，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中央领导同志对对外广播的重视，是这一时期我国对外广播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但是，应当指出，这一时期在对外广播宣传中“左”的倾向也是存在的。特别是1958年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内进行的批判所谓“反党小集团”的斗争，把对外广播宣传业务上的不同观点（实际上是正确的观点）说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右倾机会主义”，并上纲到“具备了修正主义的所有特征”，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文艺观点”等等。这次批判给对外广播的影响是很坏的，由于强调政治，忽视效果，广播节目充满说教，脱离群众需求，导致电台的威信下降。有的听众把北京广播形容为“一棵没有叶子的树”。日本的一位老听众来信说：“收听北京电台的广播总是心里不舒服，象是受训似的。”有的听众说：“北京广播形式呆板，没有什么趣味。”这些反映并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然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指导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给对外广播事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三）“文化大革命”十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对外广播事业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当时，对外广播被当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广播对象是各国的左派。对外广播和对内广播毫无差别。节目中充满了

政治说教，大话，假话，空话充斥，引起听众强烈不满。有的听众来信说：节目“政治性太强，如果有人要进行政治辩论，也不需要去听一个遥远的电台。”1967年3月，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说：“许多新西兰听众已经不听北京广播了，因为很多东西他们都听不懂，乏味，很烦人。”当时，美国有一位大学教授说：“北京电台听众极少。”70年代中期，美国有个调查报告说，北京广播在墨西哥名列第八位，只有0.4%的听众说他们每周收听一次或几次北京电台的广播。这位教授承认，北京电台在邻近国家“听众多些”但又说也不十分乐观。在泰国有1.4%的听众是收听北京电台的固定听众，而英国广播公司为4.1%，美国之音为3.4%，越南之声为1.4%。“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台听众来信每年平均只有5万封，最少的一年只有2万多封。

然而，在语种方面，由于多年筹备，“文革”中有12种新的语言节目陆续开播。其中有亚洲的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普什图语、僧伽罗语、尼泊尔语；对欧洲的捷克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另有对南美的克丘亚语开播后，由于听众都能听懂西班牙语广播，而于1980年6月停播。至此，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共有38种外语广播。即：

对亚洲地区：孟加拉语、缅甸语、柬埔寨语、英语、世界语、法语、印地语、印度尼西亚语、日语、朝鲜语、老挝语、马来语、蒙古语、尼泊尔语、菲律宾语、普什图语、俄语、僧伽罗语、泰米尔语、泰语、乌尔都语、越南语。

对非洲地区和亚洲西部地区：阿拉伯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豪萨语、波斯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斯瓦希里语、土耳其语。

对拉丁美洲地区：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对北美地区：英语。

对欧洲地区：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捷克语、英语、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匈牙利语、波兰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俄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西班牙语。

对大洋洲地区：英语。